

马戎, 2008,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第 41-46 页。

马戎、马雪峰, 2006, “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 《西北民族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135-175 页。

孙隆基, 2004, 《历史学家的经线》,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ischer, Martin Andrew, 2005,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openhagen: NIAS Press.

Goldstein, Melvyn et al, 2006,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Rural Tibet”,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cie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New York; M. E. Sharpe, pp.193-213.

## 【论 文】

#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李 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 由于西晋王朝“八王之乱”, 天下分崩离析, 匈奴、鲜卑、氐、羌、羯所谓“五胡”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 建立政权。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互相接触、学习, 互相碰撞、冲突, “到魏晋南北朝结束时, 基本上完成了五胡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彻底消弭了民族冲突的根源, 中华民族得到了又一次升华, 它在世界历史上, 迄今也不失其借鉴作用。”<sup>1</sup>在这个民族大融合过程中, 前秦不仅首先统一北方, 在政治上奠定了民族融合的基础, 而且在思想上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潮流, 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思想与实践的先锋, 而其中起主导作用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秦主苻坚。由于前秦在政治上维系统一的时间不长, 苻坚在民族思想观念上的贡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苻坚的思想观念在统一西域过程中也有充分的展示, 因此, 我们在讨论西域东部民族关系时, 也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 一、

苻坚曾多次以“中国”自居。秦建元十九年(383)正月, 前秦进军西域, 苻坚送主将吕光出长安, 特意嘱托说: “‘西戎荒俗, 非礼义之邦。羈縻之道, 服而赦之, 示以中国之威, 导以王化之法, 勿极武穷兵, 过深残掠。’”<sup>2</sup>这里既表达了苻坚不欲穷兵黩武过深残掠西域人民的主张, 而欲以儒家王化之法威服天下的战略思想, 又表达了苻坚以“中国”自居的观点。在前秦进伐西域的问题上, 史书起码有三次记载前秦君臣自称“中国”。另外两次分别是: 《晋书·鸠摩罗什传》: “会太史奏云: ‘有星见外国分野, 当有大智入辅中国。’ 坚曰: ‘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 将非此邪?’ 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 西伐龟兹。”<sup>3</sup>这里记载苻坚出兵西域的起因, 太史称前秦为“中国”; 《晋书·苻坚载记下》: “苻融以虚耗中国, 投兵万里之外, 得其人不可役, 得其地不

<sup>1</sup> 胡戟, 《魏晋南北朝伟大的民族融合潮流中的王猛》, 《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第201页。

<sup>2</sup> 《晋书》卷104《苻坚载记下》。

<sup>3</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5“前秦·苻坚”作“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 当有圣人入辅中国, 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 襄阳有释道安, 并遣求之”。



可耕，固谏以为不可。”这里记载苻坚之弟苻融反对前秦出兵西域，苻融称前秦为“中国”。此三条充分反映前秦君臣皆视本国为“中国”。

事实上，苻坚自称“中国”、以中国帝王自居，并不始于秦建元十九年（383）伐西域时，而始于秦建元十二年（376）灭前凉之后。是年，“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氏、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这是我们在史书上第一次看到前秦自称中国。以后，在同年十二月前秦灭代国之后，“坚尝之太学，召（代王）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寿，何也？’”<sup>1</sup>苻坚考察太学，与代国亡国之君涉翼犍（应为涉翼犍之子窟咄）讨论“人寿”问题，又自诩为“中国”。

我们知道苻坚是氏族，前秦是氏族建立的国家。前秦氏族自称所建国家为“中国”，是对那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仅指汉人所居地区观点的有力批判。前秦君臣自称“中国”是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历史上“中国”有多层含义：既有地理上的含义，不同时代指京师、王畿、国中、中原、内地，又有文化上的含义，某些时候代指儒家思想、传统观念、华夏文化，又有民族上的含义，某些时候代指汉族，还有政治上的含义，不同时代指施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中央政府（朝廷），清代1689年以后，“中国”则具有主权国家的含义，真正指称整个国家了。<sup>2</sup>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哪个政权占据中原，尤其是占据了长安、洛阳二都，哪个政权才有资格称“中国”。比如三国时期，魏占据了中原，魏称中国，而蜀、吴不能称之，虽然蜀主刘备是汉朝王室的后裔。如黄初二年（221）八月，孙权遣使称臣，魏臣刘晔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sup>3</sup>称魏为中国，蜀、吴为小国。前秦占据了中原，尤其是占据了长安、洛阳二都，是完全有资格称中国的。不过，前秦苻坚称中国，仍然是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的一大飞跃。原因是，苻坚是氏族，也就是所谓“夷狄”（戎狄）。秦、汉以来，历经三国、西晋，称中国者都是汉族，“夷狄”称“中国”，从思想观念上来说，是一个大的突破。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夷狄”称“中国”者，并非前秦首开其例，而是此前的后赵羯胡（中亚昭武九姓）石氏。《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徐光对后赵国主石勒曰：“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径称石勒拥有二都（长安、洛阳）而为中国帝王。《晋书》卷77《蔡谟传》载谟曰：“自勒初起，则季龙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国，境土所据，同于魏世。”此传其后又载：“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晋书》卷37《宗室传》亦载：“时石季龙死，中国乱。”石季龙乃石勒的后任（名虎，字季龙）。是当时人和后世史家皆称后赵为中国。后赵统治者石氏为羯胡，羯胡称帝中国，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夷狄称中国的先例。石赵称中国，军事斗争之外，也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斗争。石赵立国之前，时人并不接受戎狄称帝中原的观念，也不认为戎狄能够为“中国”。晋永嘉五年（311），晋将刘琨劝石勒背弃前赵，改事晋朝，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sup>4</sup>晋永嘉七年（313），石勒欲吞并占据幽州等地的王浚，假意奉表推浚为天子，王浚将信将疑，石勒使者王子春说：“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这些话虽然有偏见或欺诈的成分，但都表达了当

<sup>1</sup> 引自《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5“前秦·苻坚”。《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同。然《十六国春秋辑补》“涉翼犍”下有注：“疑作窟（上穴下出）咄”。考《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和元年条，太和元年十二月，苻翼犍（即涉翼犍）之子寔君弑父，代亡，苻坚车裂寔君，迁苻翼犍之子窟（上穴下出）咄之长安。“坚使窟（上穴下出）咄入太学”。由是“涉翼犍”当为“窟（上穴下出）咄”。

<sup>2</sup> 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开首称：“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中国”第一次作为国体概念出现在外交公文上。不过这个条约并无汉文本。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一词出现在汉文本上。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正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sup>3</sup> 《资治通鉴》卷69文帝黄初二年条。

<sup>4</sup>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时社会不接受戎狄称帝中原的思想。不过，晋太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晋咸和五年（330年）即帝位、真正拥有中原之后，在事实面前，人们还是转变了态度，承认石赵为中国帝王了。这无疑历史的一大进步。

相比之下，此前的匈奴后裔刘渊所建汉国和刘曜所改前赵，同样是在中原建立政权，却无相同的命运。刘渊字元海，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因先祖曾尚汉宗室公主，自谓汉朝外孙，而冒姓刘氏。刘渊于晋永安元年（304）称汉王，晋永嘉二年（308）称皇帝，国号汉。晋永嘉四年（310）渊死，子聪立。聪于次年攻破洛阳，晋建兴四年（316）占领长安，灭西晋。史称“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sup>1</sup>说的就是刘渊灭西晋，首开“夷狄乱华”之例的史实。<sup>2</sup>晋建武二年（318）聪死，族弟刘曜杀聪子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刘渊所建汉国合称为汉赵）。刘渊所建汉国拥有中原广大地区，并据有洛阳、长安二都，前赵也以长安为都，但是，我们在史书中却不见称刘氏汉、赵为中国的记载，上引刘琨、王子春甚至说，自古以来无戎人为帝王者，根本无视他们的存在。《晋书·刘元海载记》记：“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虽复石勒称藩，王弥效款，终为夷狄之邦，未辩君臣之位。至于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干脆称刘汉为“夷狄之邦”，虽然承认刘汉“不远儒风”，<sup>3</sup>但却诋之为“并仁义而盗之者”。可见不承认汉赵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史书不称汉赵为中国呢？原因应该是，西晋刚亡，东晋新立，东晋虽然南渡江南，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正宗所在，仍然是中国的代表。晋咸康七年（341年）燕王皝遣刘翔到东晋，求封大将军及燕五章玺，东晋尚书诸葛恢说：“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惟器与名，不可轻许。”<sup>4</sup>这里诸葛恢即称东晋为中国。晋永和十年（354年），前凉张祚僭称帝位，郎中丁琪谏曰：“陛下……而行革命之事，臣窃未见其可。华夷所以归系大凉、义兵所以千里响赴者，以陛下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竞，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sup>5</sup>这里前凉郎中丁琪亦指东晋为中国，指责张祚不当自立为帝。这些都说明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还认为东晋是中国，还不能接受戎狄为中国帝王的事实。另外，汉赵不称中国，与西晋灭后，中原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形成亦有关系。史载，刘曜于晋大兴二年（319年）四月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同年十一月，石勒亦称“赵王”，正式从汉赵国中分离出去，与刘曜前赵形成了对峙的局面。<sup>6</sup>后赵石勒灭前赵，才相对统一了中原。“始于刘渊的统一中国之业，最终经由石勒得以完成。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前赵为后赵起了先导作用”。<sup>7</sup>

由此可见，时人乃至古代史家接受戎狄为帝的思想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在西晋刚亡，汉赵甫立，中原局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尚不能接受戎狄为中国的思想观念，待到后赵建国，戎狄入主中原时日已久，中原相对稳定之后，人们才逐渐在思想观念上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过，即便如此，这个时期“中国”的称号仍然是混乱的。后赵石氏占据中原，称为“中国”，东晋偏安江南，亦自视为“中国”。<sup>8</sup>而且，后赵灭亡之后，仍然有人说戎狄不能为天子。如后赵官员姚弋仲训诫诸子说：“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

<sup>1</sup>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sup>2</sup> 賚人（或曰巴氏）李特所建成一汉应是十六国中第一个建国的。又，周伟州先生指出：“西晋亡后，北方形成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不取决于刘渊个人的行动和意志，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原因。……相反，刘渊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以各族人民反晋的斗争，推翻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政权，是有一定的历史功绩的。”《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sup>3</sup> 汉赵国统治者汉化皆较深，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的政策措施。其文化基本上承袭了汉魏以来传统的汉族文化；在语言、文字、文学、史学、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皆渗透了汉族文化思想。

<sup>4</sup> 《资治通鉴》卷96成帝咸康七年条。

<sup>5</sup> 《晋书》卷86《张祚传》。

<sup>6</sup> 周伟州：《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sup>7</sup> 谷川道雄著、李济生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sup>8</sup> 前举诸葛恢所谓“夷狄相攻，中国之利”，丁琪所谓“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皆是其例。



臣节，无为不义之事。”<sup>1</sup>姚弋仲世代为羌酋，本人是后赵重臣，历任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在石季龙时期，“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可见地位之崇重。<sup>2</sup>作为后赵重臣的姚弋仲尚且如是说，可见中原承认戎狄为帝思想观念的不易。当然，姚氏此话已不是否定石氏为中国帝王的事实，而是说戎狄为帝不可能长久了。<sup>3</sup>

前秦建国（351年）之后，在“中国”称号上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前秦建国之初虽已占据关陇，但时人并不视之为中国。最明显的例子是前凉回答前秦劝降使的一番议论。晋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前秦主苻生遣阎负、梁殊使凉州劝降，前凉辅政张瓘指责前秦：“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与石氏通好，旋见寇袭。中国之风，诚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sup>4</sup>张瓘在这里称秦为中州，而自诩为中国。前凉基本上始终以晋臣自居（张祚除外），其自诩中国，实际上就是称东晋为中国。上举前凉郎中丁琪称东晋为中国，时间也在前秦建国之初。可见当时人均不视前秦为“中国”。然而，自从苻坚秦建元六年（370）起陆续灭前燕、仇池、前凉、代国，基本上统一北方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苻坚君臣们已坚定地自称为中国，这一点前面已引诸多例证；他人亦称之为中国。如建元十五年（379），乞伏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苻坚遣国仁讨之。步颓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高会，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sup>5</sup>国仁叔侄决心反秦，但话语中称前秦为中国则无疑。

由此可见，从刘氏建立汉赵，石氏建立后赵，到苻氏建立前秦统一北方，少数民族由借汉朝后裔之名立国中原，到以自己的国号占据中原，到理直气壮地自称“中国”，一步步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而“戎狄”为“中国”的观念，亦逐渐为中原人所承认和接受。虽然前秦仍然面临着争“正统”的任务，真正民族融合的阶段还未到来，但是，夷夏之隔的藩篱已被逐渐冲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 二、

苻坚既然以中国自居，那么，他对本部族——氏族如何看待，对其他民族如何看待，简言之，他的民族观如何？前秦的民族政策如何呢？<sup>6</sup>这是需要我们考察的。

首先看苻坚对本民族氏族及羌族的态度。

苻坚视氏族为前秦的支柱力量是没有问题的。前秦的重要官职多为氏族把持，是一个明证：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把十五万氏人分派到关东镇守要地，“坚以诸氏种类繁多，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氏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sup>7</sup>以氏族为“盘石之宗”，<sup>8</sup>也是一个明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苻坚的言行中又能看到，苻坚的氏族情结并不是很深的，“中国”和“六合一统”才是他心目中最高目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苻坚任用汉族王猛，打击氏族权贵。王猛深受苻坚的信任，“朝政莫不由之”，氏族贵族对此非常不满。“特进樊世，氏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

<sup>1</sup> 《晋书》卷116《姚弋仲裁记》。

<sup>2</sup> 《晋书》卷116《姚弋仲裁记》。

<sup>3</sup> 姚氏后归东晋，其子又降前秦，前秦淝水之战败，其子姚萇杀苻坚，建后秦。

<sup>4</sup>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sup>5</sup>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sup>6</sup> 田继周等著，《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民族观，简言之，就是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看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sup>7</sup> 载《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元五年条，第3295页。不过，苻坚此举分散了氏族的力量，尤其是将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同时迁往关中，所谓“远徙种人留鲜卑”，对前秦造成不利影响，则是苻坚始料未及的，并非出自他的初衷。

<sup>8</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公开挑战王猛的权威。“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氏，然后百僚可整。’”后来，樊世与王猛又发生冲突，“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廐。诸氏纷纭，竟陈猛短，坚恚甚，慢骂，或有鞭撻于殿庭者。”经过这一番斗争，王猛在朝中的地位得到确立，“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而王猛在苻坚的支持下，继续打击氏族贵戚强豪（包括其他族）不法者：“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王猛的做法得到苻坚的大力赞赏，“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sup>1</sup>而前秦也因此“风化大行”，国力大增。

苻坚对尚未“王化”的氐、羌态度，也体现出他的“中国”情结。《晋书·苻坚载记下》载：秦建元十二年（376），“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这里苻坚将西障氐、羌称为“彼种落”，而称自己为“中国”，鲜明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将自己视为高于本民族的国家力量和中国的代表。这里苻坚下令对氐、羌抚谕为先，武力为后，目的都是为了“征其租税”，而征租税表层含义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深层次含义则是为了将“彼种落”纳入到国家的统治范围内。苻坚将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纳入到国家统治范围内，目的就是增强“中国”的力量，实现“六合统一”的目标。苻坚维护其政策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史载苻坚“乃使殿中将军张甸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违令纵掠氐羌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甚至陪上了性命。而苻坚此举获得了极大成功：“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sup>2</sup>朝着“六合统一”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其次看苻坚对其他民族的态度。

苻坚对汉族的态度，在上述有关王猛的问题上已十分清楚，我们在下面第三部分还将继续讨论有关汉化的问题。这里重点讨论其他民族。

对匈奴。秦甘露二年（360），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请于内地垦田，坚许之。但云中护军贾雍遣属下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以恩信怀戎狄，而汝贪小利以败之，何也！”免贾雍官，遣使修和还其所获，示以信义。结果，卫辰“入居塞内，贡献相寻”。<sup>3</sup>

对前燕鲜卑。秦建元五年（369），前燕慕容垂避害投奔苻坚，王猛认为垂为“非可驯之物”，建议“不如除之”，苻坚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而收留了慕容垂。建元六年（370），秦灭燕，又赦燕王“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sup>4</sup>其后，太史令观天有“燕灭秦之象”，劝坚诛慕容暉及其子弟，坚不但不纳，反而拜慕容暉、慕容垂等人官职。苻融上疏谏曰：东胡“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坚则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sup>5</sup>这番话是苻坚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将夷狄“视为赤子”，目的是“混六合为一家”，统一天下。这番话在《晋书·苻坚载记下》记作：“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意思相同，而所谓“黎元应抚，夷狄应和”，则表达了苻坚处理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总则。

对代国。秦建元七年（371）灭代国，坚以代国荒俗，未参仁义，令其主涉翼犍（当为其子窟咄）入太学习礼。又散其部落于汉朔边故地，优复三年无税租。

<sup>1</sup> 均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2</sup> 《资治通鉴》卷101穆帝升平四年，第3281页。

<sup>3</sup> 《资治通鉴》卷101穆帝升平四年，第3282页。

<sup>4</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sup>5</sup> 《资治通鉴》卷103孝武帝宁康元年条，第3267页。



对西域诸国。秦建元十四年（378），秦凉州刺史梁熙秉承苻坚旨意，遣使西域，宣扬秦之威德，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sup>1</sup>苻坚令返还大宛马，以“示无欲”。并命群臣作《止马诗》。虽然有人视此为“好名之过”，<sup>2</sup>但这是与苻坚所谓“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是他“视夷狄为赤子”的真实反映。建元十九年（383），苻坚送吕光伐西域，令其“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也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另外，如吐谷浑碎奚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湟川侯。等等。

总之，在苻坚所建立的“中国”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力图促进民族融合的苦心，也能看到他力图推行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政策措施。

相比较之下，后赵虽然也称“中国”，但却大不如苻秦。石氏统治者虽然也有一统天下的愿望，也任用汉族治理国家，如石勒任用张宾，“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而且在法律上也规定：“不得侮易衣冠华族”，<sup>3</sup>并实行一些带有汉化倾向的措施，但是，却没有“视之如一”的民族观念，而实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如“号胡（羯）为国人”，称汉人为赵人，把二者视为不同的等级，实行胡汉分治的双轨制度。<sup>4</sup>“胡汉分治的双轨制就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确认了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sup>5</sup>这种民族隔阂政策在石虎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而到汉族冉闵推翻后赵建立冉魏政权实行报复政策：“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sup>6</sup>上演了胡汉民族互相仇杀的大悲剧。比较而言，苻秦称中国，“中国”不仅具有占据中原的地理含义，而且具有不分汉族与四夷、民族融合的政治含义。苻坚的民族思想比后赵的民族思想先进得多，苻秦“中国”称号的内涵比后赵“中国”称号的内涵也丰富得多。这既是前秦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

### 三、

苻坚的先进民族思想，源于他本人较深的汉化程度，也源于氐族较深的汉化水平。氐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是少数民族中汉化最深的一个民族。《魏略·西戎传》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衿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衿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sup>7</sup>说明氐族虽然有特定的风俗习惯和独特语言，<sup>8</sup>但是，在汉朝时期，已“善田种”、“能织布”，与汉族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接近，有较进步的农业、手工业和定居生活了；氐人又多通汉语，普遍使用汉姓，说明与汉族的联系较多，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而苻坚家族是氐族中汉化最深的一族。苻坚之祖苻洪在后赵石虎时，被授以流人都督，迁往关东，定居枋头（今河南浚水旁县），其所辖人员已不限于氐族，而杂有各色人等。“苻洪枋头之众中氐人数量不会很多，至少不会多于汉人。后赵败乱以后，所在兵起，苻

<sup>1</sup> 《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

<sup>2</sup> 引文见《资治通鉴》卷 104 孝武帝太元三年条，第 3287 页。胡三省在“命群臣作止马诗而反”之下注曰：“反则反之，何以作诗为哉！此亦好名之过也。”

<sup>3</sup> 《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

<sup>4</sup> 如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设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等等。

<sup>5</sup> 李文才，《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3 页。

<sup>6</sup> 《晋书》卷 107《石季龙载记下》。又，冉魏政权仅存三年即灭亡。

<sup>7</sup> 引自《三国志·魏志》卷 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又，“语不与中国同”之“同”当为衍文。

<sup>8</sup> 陈寅恪先生认为，“氐人与南诏的语言同出一源”。“白马氐（武都氐）在《后汉书》列传七六《南蛮西南夷传》中，被列为西南夷之一，而南诏“自言哀牢之后”（《旧唐书·南诏蛮传》），也是西南夷。氐族“能织补布，善田种”，编发，而《后汉书》中，“能耕田”，“辨发”，是西南夷的共同特征。……从语言、生产、习俗来看，氐族与西南夷族南诏之先六诏，实同出一源”。载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 1987 年，第 88 页。马长寿先生认为：“氐族在二三世纪时，仍然保持自己的部族语言。”载《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20 页。



洪众至十余万，亦当氐、汉相杂，数量上氐人不会是主体。”<sup>1</sup>“苻氏控制的军事政治集团，摆脱了原有的氐人部落结构形式，而以汉族的部曲组织来代替。在部曲组织内原有部落贵族的特权被消灭，而以军功定爵级，以才能定升迁。……苻氏集团在关东的18年里，不仅改变了本身氐人部落的结构，而且与武都、略阳一带的氐人部落实际上没有多少联系，客观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与汉族社会经济相结合的一切便利条件。苻洪的后代差不多都是在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sup>2</sup>苻坚八岁时，就主动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sup>3</sup>祖父苻洪虽然讶其不同凡响，但仍欣然允其所愿，苻坚因而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而这一点为他自身的汉化以及日后推行汉化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苻坚执国柄后大力推行儒学汉文化。“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sup>4</sup>这些记载既表达了苻坚重视儒学的态度，表现了苻坚推行儒家文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苻坚自身儒学修养的高深。苻坚不仅在中央、地方推行儒学，而且在军队和后庭宫掖也倡导儒学汉文化：“苻坚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大学生明阴阳兵法，教为将士”<sup>5</sup>“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sup>6</sup>苻坚如此不遗余力的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是极其难得的，而这种举措的实质，就是自上而下的全力推行汉化。

苻坚的治国理念是奉行仁德之政，有关这一点，谷川道雄先生曾进行过专门论证，<sup>7</sup>论之既详，此不多及，仅指出，前面我们所阐述的有关苻坚处理匈奴、鲜卑、氐、羌、西域等民族的政策措施，既是苻坚优待各民族的民族政策，也是苻坚推行仁德之政的具体表征。另外，史称每遇自然灾害，苻坚无不作为警示，“愈修德政焉”。如“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坚惧而愈修德政焉。”<sup>8</sup>苻坚“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鰥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sup>9</sup>也都体现了他继承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推行仁德之政的特色。如所周知，仁德之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精髓，可见苻坚的治国理念是得儒家政治学说之精髓的。至于苻坚在前秦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情况前人讨论较多，本文不拟多论。

总之，由于苻坚推行儒家文化，继承传统制度，奉行仁德之政，前秦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国力强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sup>10</sup>苻秦统治下的中国一派盛世景象。

#### 四、

苻秦既然执行仁德之政，国内一派盛世景象，为什么淝水之战一败而导致前秦全面崩溃呢？这是千百年来史学家一直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苻坚的中国观民族观必须关注的问题。

<sup>1</sup> 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sup>2</sup> 黄烈，《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转载《古史文存》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

<sup>3</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4</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5</sup> 《太平御览》卷359引《前秦录》。

<sup>6</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7</sup> 谷川道雄著、李济生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7页。

<sup>8</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9</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sup>10</sup>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司马光说：“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萇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sup>1</sup>这是说古人总结前秦之败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苻坚未杀鲜卑慕容垂、羌酋姚萇，导致了前秦的败亡，持这种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另一种观点认为，苻坚“骤胜而骄”，造成了前秦不可挽回的败局，司马光本人即主此说。

在前秦败亡的问题上，今人比古人的研究深入得多，但大体上仍有这两种看法。如吕思勉先生说：“坚知晋之终为秦患，命将出师之不足以倾晋，而未知躬自入犯之更招大祸，仍是失之于疏；而其疏，亦仍是失之于骄耳。”<sup>2</sup>认为苻坚伐晋是考虑不周到（失之于疏），而考虑不周到是因为骄傲。然而更多学者认为苻秦是败在民族关系方面。如陈寅恪先生说：“苻坚不能成功也在未将民族关系弄好。……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如果不攻取东晋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汉人正统的地位，也就不能降服鲜卑等族，且汉人也有离心的倾向。只有攻取东晋，推行汉化，方可统一胡汉。苻坚所以坚持南伐，原因在此。……苻融所说的隐忧，苻坚岂能不知？苻坚之所以必欲南进，正是因为他了解民族问题未能解决，只有南伐，取东晋（文化正统所在）而代之，才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初不料会在淝水战败。”<sup>3</sup>陈先生并指出后世北魏孝文帝也没解决民族问题，直到隋才解决民族融合问题，因此也才有了南北的统一。陈先生的观点非常精辟，道出了苻坚必欲伐晋的目的——争正统，也道出了苻坚等人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民族未融合。

谷川道雄先生说：“苻坚与两赵、前燕大不相同。可是苻坚结果也没能超越种族的原理，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说，苻坚与此前的五胡国家一样，都遇到了同样的时代障碍。种族主义的制约在两赵及前燕出现于宗室内部，而在苻坚时期，则通过鲜卑问题的形式从外部冒出。”<sup>4</sup>也认为前秦败在外部民族关系问题上，而这是一个“时代的障碍”，并非个人的意志所能解决的问题。

田余庆先生说：“十六国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永嘉之后至后赵之亡为第一阶段（311-350）；后赵之亡至淝水之占为第二阶段（350-383，苻坚政绩主要在这一阶段）；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为第三阶段（383-439）。……苻坚的治绩不论如何良好，都无法使历史越过这个阶段而达到像北魏中期以后那样的水平。……苻坚统治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来估量。……苻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足够的时间。”<sup>5</sup>将苻坚的胜败纳入历史总的进程中考量，无疑具有更深邃的眼光。

先贤的论断都非常深刻、正确，笔者还想指出来的是：苻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民族认识方面有误区，这一点也不应该忽略。这个误区表现在两个认识方面：一个是对内部民族关系认识上，苻融谏伐晋说：“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虽然“苻融所说的隐忧，苻坚岂能不知？”但苻坚未必认识到那么严重，因为如前所说，苻坚实行的是德治，他对待鲜卑等族是非常宽厚的，朝中多次有人建议杀慕容垂，他皆不同意，他本人坚信德治感化的力量，自认为没有亏待这些民族，因而幻想这些民族将投桃报李，只到淝水战后，才大失所望，这在他怒斥鲜卑慕容玮（日旁）

<sup>1</sup> 《资治通鉴》卷 106 孝武帝太元十年条，第 3348—3349 页。

<sup>2</sup> 载《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230 页。又，吕先生认为坚之必伐晋是为了不给予孙留后患，并举唐太宗伐高句丽说“不遗后世忧也”，以为佐证。很有见地。

<sup>3</sup>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 1987 年版，第 230—231 页。

<sup>4</sup>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 页。

<sup>5</sup>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2—243 页。





的话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殆不可以国士期也。”<sup>1</sup>，说明他原本以为或期望这些人是讲信义、讲道德良心的“国士”，但却未料到他们是忘恩负义的“畜牲”；二是对外部民族关系认识上，他自认为完全继承了汉族封建统治的传统，宣扬汉族封建文化并推行汉化，与汉族已无差异，因而可以与东晋争正统，这一点可以从他多次以“中国”自居，多次以汉族封建文化代表的身份说话充分体现出来。而这两种认识的根基，都在于他对德政的认识，在于他对德政作用的价值判断。他相信衡量正统的标准是封建德政，谁施行德政，谁以德治国，谁就可以成为正统天子。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与苻融有关伐晋的辩论中：“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sup>2</sup>苻融认为本国是戎狄，非正统所在，东晋虽然微弱，却是中华正统，因此不能伐晋；苻坚批评苻融不达变通，不懂得施行德政可以转变为正统帝王，前秦实施德政，已经“以夷变夏”，因此可以取代东晋。从理论上说，苻坚无疑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正统与否，不在于他的民族属性，而在于他是否施行德政，是否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符合的多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苻坚的这种理念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代表了先进思想水平，但是，从实际结局来说，苻融却是正确的，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前秦伐晋导致前秦覆亡。但这只能说明苻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而苻坚超越了历史。

《晋书》卷 58《周访传附虓传》载，周虓因母被秦所获降于秦，“自是每入见坚，辄箕踞而坐，呼之为氏贼。坚不悦。属元会，威仪甚整，坚因谓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攘袂厉声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sup>3</sup>这个例子典型地说明，“尽管前秦自以为完全继承了汉族封建统治的传统，但在汉族封建士人眼中仍然是僭伪和窃据；尽管它在极力宣扬汉族的封建文化，但仍然被目为异类和禽兽。”<sup>4</sup>苻坚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民族融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于他太“超前”。他是时代的先锋，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潮流，但在多数人还没有完成这个思想转变，在民族尚未较好融合，实力尚且达不到的时候，冒然发动灭晋战争，最后就只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 【征文】

热诚欢迎关心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读者和研究生向本《通讯》提供文章，内容可以是有关民族研究的理论探讨，也可以是在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调研报告，也可以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读书笔记，形式和字数不限，但希望能够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以及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投稿请发到：[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于长江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sup>1</sup> 《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下》。

<sup>2</sup> 《资治通鉴》卷 104 孝武帝太元七年条，第 3304 页。

<sup>3</sup> 《晋书》卷 58《周访传附虓传》。

<sup>4</sup> 黄烈，《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古史文存》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9 页。

